

那年，体育场的呐喊

王成家



现场狂热的球迷。

通讯员 摄

2025年秋，指尖划过屏幕，无论是“苏超”球迷挥着围巾唱彻看台的热烈，还是“湘超”场边孩童追着皮球跑的鲜活，总让我恍惚跌回二十余年前的那个午后。那时湘潭市体育中心的看台栏杆还凝着阳光的温度，万千观众的呐喊从胸腔里涌出来，几乎要掀翻场馆的穹顶。那是我人生头一遭亲临甲A赛场，像一粒种子落进土壤，往后每一次回想，胸腔里仍能泛起当年那阵滚烫的悸动。

我与足球的关系，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悄悄牵起。1990年，我还是个捧着衣角的少年，守着14英寸的黑白电视，看第十四届世界杯在意大利铺展。来自非洲喀麦隆队的罗杰·米拉，三十八岁的年纪在当时的世界杯赛场已算高龄，可一旦进球，他便张开双臂自在起舞。球网震颤的瞬间，他笑得灿烂，牙齿在黑皮肤的映衬下亮得晃眼。我跟着屏幕里的人雀跃，那时还不懂“桑巴舞”的意涵，只觉得足球像有了魔法，把跨越山海的欢喜，轻轻放进了我的掌心。

自那以后，我成了彻头彻尾的“足球迷”。放学回家写完作业急急地扒两口饭，就守着体育频道不肯挪窝；攒了半年零花钱买的《足球周刊》，封面是身披国家队战袍的范志毅，我把它郑重地压在书桌玻璃下，上课走神时偷瞄一眼，心里就满是欢喜。中学体育课上，我们一群男生在草皮斑驳的操场踢一颗纹路磨平的旧球，我总抢着当后卫——不是不爱进球的畅快，而是站在球门边，把队友漏过的危机一一拦下时，心里才格外踏实。

2002年10月，我在湘潭市电机子弟中学实习，教高一语文。那天刚讲完《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》，学生屠啸追着跑进教室：“帅哥王，您喜欢足球吗？周末体育中心有甲A比赛，八一振邦主场对深圳平安，我有票！”他扬了扬手里的票根，红色油墨印着“湘潭市体育中心”，那行字落进眼里，我的心跳骤然快

了几拍。在电视机前看了十几年的比赛，从没想到，有一天能离那些奔跑的身影这么近。

比赛日是个周六，天刚破晓就证明透亮，空气里飘着桂花树的甜香。我和另外两个实习老师，跟着学生屠啸、宋倩，一路步行往体育中心去。沿途尽是穿红球衣的球迷，有人举着“八一加油”的手牌，有人哼着即兴编的助威歌，人流像道红色的河，朝着球场的方向涌去。检票的门卫大叔笑着打趣：“学生娃也来看球呀？听说今天深圳平安队的郑智会上场，可得好好看！”那时我还没听过这个后来成了中国足坛传奇的名字，只把“郑智”二字像揣了块糖似的放进心里，满是期待。

体育场里早坐满了人，红色的看台像铺开巨幅绸缎。风一吹，“八一振邦，湘潭雄起！”的声

浪滚过来，震得耳膜嗡嗡响。我们挤在看台中间，前排的球迷递来望远镜，“小伙子，快看，球员正热身呢！”我接过来望过去，绿色的草皮上，身着白衣黑短裤的八一队球员身影交错跳跃——系鞋带时弯腰的弧度，喝水时仰头的瞬间，每一个细节都比电视里真切百倍。屠啸在旁边激动地喊：“老师！那个5号就是深圳队的郑智！”我急忙调准镜头，看见个高瘦的年轻人正对着队友笑，阳光落在他背后的号码上，数字“5”亮得像颗星。开场哨响的刹那，看台先静了一秒，随即爆发出更汹涌的呼啸。八一队发起进攻时，全场观众齐刷刷地站起来，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跳起来，手里的加油棒被捏得变了形。有一次深圳队的郑智带着球往禁区冲，八一队员快步插上断了球，看台顿时炸了锅：“好险！”身旁的大爷拍着我

的肩喊：“深圳队这个5号跑得真快！”我笑着点头，目光却不敢从球场上挪开。

那场比赛的比分，如今早已记不清了，可有些画面，却刻在心里忘不掉：每当八一队逼近对方球门，全场万人屏住呼吸，射门的瞬间，要么一起叹息，要么一起欢呼；屠啸喊哑了嗓子，我递过矿泉水，他喝一口又接着喊；中场时有人起头唱《歌唱祖国》，全场人跟着唱，歌声裹着阳光飘得很远；终场后双方球员绕场致谢，郑智朝看台挥手，我们也用力挥着手，直到他们的身影钻进通道，还会不得走。

回去的路上，屠啸说：“帅哥王，下次比赛我还叫你！”我点了点头，心里却清楚：那天的阳光、呐喊、草香，还有望远镜里的笑脸，已经够我记一辈子了。后来我结束实习回了大学校园，屠啸寄来一张照片——他站在体育场门口，身后是“甲A联赛”的广告牌，笑着比了个“V”字。我把照片夹进实习手册，和那张渐渐泛黄的票根放在一起。

这么多年，换了工作，搬了家，那本《足球周刊》和实习手册却一直带在身边。偶尔翻出那张票根，指尖仿佛还能触到当年的阳光，眼前仿佛还能看见那个穿5号球衣的年轻人，和我们三个实习老师、两个学生，在看台上尽情跳跃的下午。

如今“苏超”“湘超”慢慢火了，朋友常说：“你当年看的甲A联赛，可比现在热闹多了。”可我觉得，足球比赛热闹的内核从来没变——无论是二十多年前的甲A联赛，还是如今的地方联赛，场上奔跑的球员、台下呐喊的球迷，心里揣着的都是同样的热爱。

有时会想，要是能回到2002年的那个周六，我还是会跟着屠啸往体育场走，还是会看台上尽情跳跃，还是会把那天的阳光与呐喊刻进心里。因为那不只是一场比赛，更是我青春里一枚鲜亮的印记——像树木的年轮，把我对足球最初最炽热的爱深深裹住，也封存着那个秋天，湘潭市体育中心赠予我的最真实的欢愉。

作家写作家



姜还是老的辣

谢永华

你们猜对了，今天我要写的人物，便是爱吃生姜，还戏称自己是“美女姜”的姜贻斌。透过他那副黑色边框眼镜，能看到藏在其后的一双透着睿智光芒的眼睛。他有两副眼镜，电脑写作时用一副，看书、看报、看电影则会换上另一副。

我读到的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《火鲤鱼》，是一位老乡赠予我的。老乡很崇拜他，说他的很多作品他都看过，像长篇小说《左邻右舍》《火鲤鱼》《酒歌》，小说集《你会不会出事》《祭祭》《孤独的灯光》《漂泊者》等。听老乡这么一说，我心里痒痒的，赶紧在网上买了几本他的作品，又找他借了几本。有时候，我会被他书中的情节逗得捧腹大笑；而有时候，又会默默地拿起纸巾擦拭泪水。毫不夸张地讲，我完全被书中的情节深深吸引，仿佛陷入其中，难以自拔。作者那幽默诙谐的语言、入木三分的人物刻画，以及直击人性的灵魂拷问，恰似暗夜中的点点星火，让人眼前一亮。

我总在想，他每天上午要睡觉，要“持续充电”，晚上又要进行雷打不动的“三部曲”——喝酒、唱歌、吃夜宵，他这么多作品，到底是什么时间写出来的呢？

姜先生是个既幽默又低调的人。每当朋友们称他为大作家时，他总会赶忙接话：“什么大作家？不过是年龄大，坐在家就成大坐（作）家啦。”他话音刚落，朋友们就被逗得哈哈大笑。在我看来，他多数时候能把人逗得捧腹大笑，可有时也会让人无言以对。有一次，一位朋友请他看稿子，他连酒都顾不上喝，拿着手机仔细翻看，表情时而严肃，时而微笑。过了十几分钟，他评价道，这位朋友的稿子毫无章法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根本就不知道在写些什么，他直接回复对方，让其改好了再发过来。后来大家提起这事，他说那位朋友可能生气了，嫌他说话过于直白，自此便没再联系他了。

他常说，作家就应以作品说话，而他也确实做到了。文学以人为本，了解姜贻斌的人都知道，他不仅不遗余力地帮助新人成长，为他们看稿子、提建议，甚至还予以推荐发表。稿子发表后，他还会请新人吃饭。有人说姜贻斌，按道理应该是作者请他吃饭才对。他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这有什么，高兴就好。”

实际上，他是个极为节俭的人，一双休闲鞋四季都穿着，硬是被他穿出了凉鞋、皮鞋、棉鞋的不同感觉。夏天时，我们常见他穿的就是两件已穿了多年的衬衣，一件是红白格子的，另一件是蓝白格子的。他对生活所求不多，菜只要有盐味、煮熟了就行。然而，他对写作却要求极高，只要有一个字不满意，就会思索许久，不是上网查询，就是翻阅那本比他年纪还大的字典，甚至打电话向朋友们请教。

在小说中，他关注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无论是乘坐公交还是地铁，遇到老弱病残之人，他总会礼貌地让座，全然不顾自己已是古稀之年。他还时常笑称要去派出所改年龄，说时间过得太快，太吓人了。或许是家族基因好，又或许是他善心获得的福报，他看上去颇为年轻。所以他常开玩笑说：“我今年十八岁，只跟零零后出生的人玩。”

有朋友笑他，你小说发表了要请客，不然你那么多稿费，怎么吃得完？他笑笑说，朋友们不请我吃饭，我晚餐都不知道在哪里吃了？我是上有老下有小，责任重大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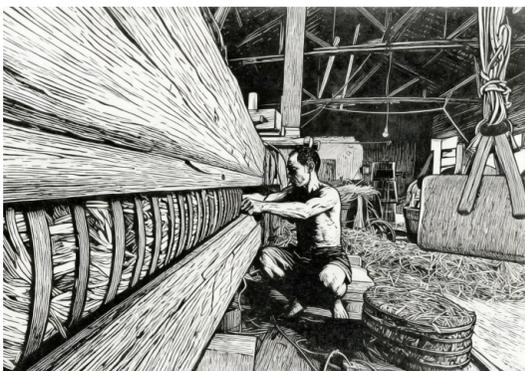
他身兼多重身份，时而被人亲切地称作“三哥”，时而又化身充满活力的“闹药”，有时还被尊称为“姜爹”。

正所谓“姜还是老的辣”，这份“辣”不仅体现在他默默地写作上，还有他对文学后辈的无私的扶持，对朋友发自内心的诚挚，以及对写作始终如一、源源不断的热爱。或许，电脑键盘上那熟悉的敲击声，便是他永葆年轻的秘诀吧。

（谢永华，中国作协会员。姜贻斌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）

木榨神韵

柯云



我的家在沅水上游的一个土家山寨，平均海拔800余米，遍地油茶，杂以奇花异木。这生我养我的地方，使人留恋的东西很多，不过最感动我的还是那个古老的木榨坊，在我脑海中经久不息是那“嘭嘭”如春雷般的木榨撞击声。

榨坊是土家汉子李三老信掌管。他常年穿一身油光黑漆漆的衣服，呆板木讷，那样子，看起来有些可怕。在我眼中他的命运是和木榨连在一起的。木榨是用巨樟做成的，酷似两条黄牛并列的庞然大物。撞杆一般以檀木制作，两丈多长、一百多斤重，撞头圈有铁箍，撞杆中部系上铁链，悬在半空架的木架上。打榨时，李师傅等人赤膊上阵。他抱着撞头，四个伙伴搂住撞尾，同时碎步后退，并将那撞杆尾部高高举起，蓄足丹田之气，大家齐力以猛虎下山之势向木榨飞奔过去，只听“嗨”地一声吆喝，撞杆便重重地撞在木榨带铁箍的楔子上，然后就听见油汁注入油盆的“啵啵”声。李师傅的那一声吆喝，撞杆撞击的那一声巨响，天摇地动。直吓得我魂飞魄散，倒退几步。

但是，正像小孩怕爆竹一样，既怕又好奇。我便常在放学后，偷偷跑到榨坊里看打榨。开始，我只是远远地站在门槛上望着，每当撞杆将要击到木楔上的那一瞬间，我便捂住耳朵。久而久之，我的胆子便大了起来，不仅走近去看，甚至爬上石碾的木轴上坐着，随着黄牛有节奏的脚步，悠悠游哉地旋转，直到太阳的辉煌从门洞消失、石碾旋转的影子渐渐暗淡时，我才忘情地匆匆忙忙向家中跑去。

有一回放学归途陡遇大雨，我一头钻进榨坊，可雨总是下个不停，李师傅便把他的油纸斗笠和棕蓑衣让我穿戴回家。次日，我送雨具去时，他留我吃饭，那干炒的酸辣菜，在上面淋上用铁铲烧煎的熟茶油，又香又脆，简直比山珍海味还要美。从那时起油榨坊成了我的第二课堂。

我到榨坊去玩得更多了，渐渐和李师傅有了深厚的感情。李师傅给我讲了一个与木榨有关的动人故事。

那是民国三十三年，日寇进犯湘西，一天一个翻译官带上两个全副武装的鬼子进寨寻找花姑娘，听到木榨声，大概出于好奇，

闯了进来。一个鬼子抓住李师傅喝问：“什么的干活？”李师傅严厉地答：“打油。”话间，心生一计，向伙计们使了个眼色，决定趁机收拾敌人。他故意让两个伙计身子叠起，挡在木楔上。他和助手们摸起撞杆向对方的胸膛撞去，因为功夫到家，恰到好处，被撞之人，安然无恙。李师傅诱敌上钩的这一动作，让鬼子看得心中发痒，非要试试，竟不顾翻译的劝阻，早已学着样子双叠在木楔上。李师傅见敌人中计上钩，又向助手们暗示，运满民族之气，发泄国仇之恨，猛地露雳一声撞去，两个鬼子惨叫一声，霎时血浆四溅。翻译早已吓得逃之夭夭了。从此，木榨变成了神槌，故事越传越神。

特殊年代，我这个身为民族干部的业余作家，因写小说而挨了批斗。有一天，我从榨坊前经过，李师傅在路口叫住了我，把我带到榨坊，悄悄塞给我几元钱，还给了我两瓶熟油。想不到，李师傅因同情我，也被揪上台批斗。第二天，李师傅就病了，人们送他回家时，看见榨坊里撒了一地被撞杆撞碎了的木楔，满眼凄凉。

后来，我被落实政策进城工作了，再也见不到李师傅，再也没听到过故乡的木榨声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，我又继续从事热爱的民族工作。有次因调查民情，发放少数民族灾民救济款，回了一次故乡，特地看望李师傅。他虽比以前瘦多了，但精神矍铄，身板硬朗，又干起了打榨的老本行。我特地在榨坊玩了一天，又一次坐在石碾的木轴上，品味童年的乐趣。

这一天，我又在榨坊里吃了一顿油炸酢辣椒，这一顿吃得比当年还要甜美。

斗转星移。前几年回到家乡，一打听，传了多少代的木榨和它的主人，都已作古了。木榨成了文物，也成山寨巨变的见证。取而代之的是靠电力发动的“隆隆”机榨声。然而，当我来到被封的老榨前时，却又见到了当年的李师傅抱撞杆那种近似擎天拔地的情景，又似闻木榨声，声声入耳。情不自禁地念起了诗人梁上泉的即兴诗句“木榨有神韵，犹闻撞击声”。泪水一涌而出。不过，应该是热泪吧，因为那毕竟是时代的更替。

桑葚染流年

刘瑜

路过一条小道，低头间，脚下的地面泛着一团团“墨痕”，好似一幅晕染的水墨画。抬头一看，原来这有一棵桑树。繁繁密密的枝叶间，挂着一串串桑葚，有的呈紫黑色，像一颗颗墨色宝石；有的呈紫红色，像小巧玲珑的拇指灯笼；还有的黄里透红，着实可爱。

正准备踱步离开时，瞥见两位女生驻足在树的那一侧，其中一个从包中掏出塑料袋，另一个则伸长胳膊，纵身一跃，够下来一条树枝，笑盈盈地摘下桑葚来。用手拽着树枝的那位轻声叮嘱：“小心点哈，掉身上可不好洗。”另一位则大大咧咧地说：“没事儿，掉衣服上就当植物染了，现在正流行呢！”

站在一旁的我，倏地想起儿时的陈年往事。那时，我整日跟着祖母，老早就学会了针线活。祖母戴着老花镜缝补，我就在一旁学着她的样子给娃娃做衣服。有一天，我竟突发奇想，要给碎布头染色。我知道指甲花和桑葚能染色，但指甲花染色用的是花瓣，捣碎后取到的汁液太少。于是，我把希望寄托在后山那棵桑树上。

那时，我还养着几条蚕，每天都要去后山采摘桑叶。记忆里，蚕结茧时，桑树上的桑葚也就纷纷结出来了。我便盼着桑葚从绿色变成黄色，再到浅红、绯红。待桑葚变成紫黑色时，我雀跃得像只飞鸟，先狼吞虎咽地吃个够，吃得满嘴都是紫黑色，然后兴致勃勃地捧着吃剩的桑葚，回家捣鼓染布。

我将桑葚倒入瓷碗，用木棍捣烂，然后把一块白色的确良碎布头浸泡在汁水里，翻来覆去地揉压，让

汁水更好地渗透到布里。第二天，我拿出布头，它已被染成淡淡的紫色，我也舍不得清洗，生怕洗掉了颜色。后来，我拿着这块泛着桑葚味道的布头，欣喜地给娃娃做了一条裙子。

多年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古人也是用草木给织物着色的。南唐学士徐锴为《说文解字》中的“染”字作了如下注解：“从水，水者所以染。从木，木者槐茜之属。从九，九者染之数也。”草木染，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染色技术之一。当人们将植物的色彩融入织物时，也将对自然的情思渗透到衣裳中，这或许是远古的中国人感知自然与色彩的独特浪漫吧！

又到“郁郁林间桑葚紫”的季节，我和女儿讲起儿时往事，她来了兴致，也想动手感受植物染的浪漫。于是，我陪她去楼下采来几把紫黑色的桑葚，将它们捣碎，用橡皮筋在白色纱布上随意打几个结，再将一小块白布泡入桑葚汁中浸染，做成了一条浅紫色的手绢。看到亲手完成的扎染作品，女儿兴奋不已。在她纯真的笑脸中，我仿佛看见了自己童年的模样。

光阴似水，当年用桑葚染布的小孩已经长大，但年年岁岁的当下，总有一群孩子对植物染充满好奇与热爱。那一棵棵站在初夏里的桑树，不仅把生命果实的底色积攒得如此浓烈，也将我们的流年染得色彩斑斓。

